



复旦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新编第957期 2013年6月5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31-0801/G

我校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

本报讯 5月20日,上海市文明委举行2013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文明委主任韩正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副校长许征代表学校上台领奖。

我校(含复旦附中)被上海市政府命名为2011-2012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两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将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贯穿于学校履行社会责任的各

项工作之中,从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的四大功能切入,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

我校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的还有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眼耳鼻喉科医院、肿瘤医院、华东医院、金山医院。

此外,护理学院MDA(神经肌肉疾病协会)志愿者团队获上海市十佳好人好事称号。

要闻简报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返校作报告

本报讯 5月3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校友回到母校,为全校中层以上干部和党校培训班学员作“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朱文文主持报告会。

王家瑞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要职能,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深入阐述了我国的对外工作方针。

华山医院赵曜教授当选上海十大杰青

本报讯 5月27日,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暨“中国梦·青年行”系列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我校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赵曜当选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同日,华山医院副院长、第十四届上海十大杰青获得者徐文东教授受聘“中国梦·青年行”活动导师。文/戴润明

翁铁慧会见我校中美合作项目美方代表团

本报讯 5月27日,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在市府贵宾厅会见了美国阿帕拉契亚州立校长Kenneth Peacock一行。校长杨玉良陪同会见。

Kenneth Peacock此次来沪参加上海论坛,并出席我校和阿帕拉契亚州立大学自1999年开始的合作项目——“何兰学者”项目校友会活动。文/李红

上海教卫党委书记薛明扬应邀我校演讲

本报讯 5月23日,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书记薛明扬应邀到我校作题为“现状、困难、思路——当前上海教育发展的若干基本情况”的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朱文文、常务副校长陈晓漫、副校长陆昉出席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主持报告会。

薛明扬曾任我校副校长等职务,现任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书记、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文/陈洁

援外医疗 50 周年座谈会举行

弘扬服务国家服务人群传统 坚持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本报讯 5月30日,复旦大学援外医疗50周年座谈会暨108周年校庆学术文化周活动闭幕式在枫林校区举行。副校长、上海医院院长桂永浩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校医院管理处处长夏景林介绍了我校援外医疗情况。会议由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主持。

1963年4月6日,中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启程奔赴阿尔及利亚,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援外医疗序幕。根据原卫生部与原上海市卫生局的部署,1965年5月,我校附属华山医院潘银英医生、华东医院顾同进医生、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巫善明医生前往索马里开展援外医疗工作,成为我校附属医院中最早的援外医疗队员。50年来,复旦共计197人次派往非洲、亚洲及大洋洲的11个国家开展援外医疗工

作。目前,我校附属医院还有9位援外医疗队员仍在摩洛哥的塞达特及拉西迪亚从事援外医疗服务。(详见4-7版)

座谈会上,校附属中山医院顾宇彤、华山医院何勤、儿科医院孙道开、妇产科医院方芳、眼耳鼻喉科医院袁雅生、肿瘤医院

尹华、华东医院王好平、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巫善明、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吴静娴、金山医院张康乐、浦东医院(筹)鞠建平等10位援外医疗队员代表讲述了他们的援外故事和工作思考。

桂永浩对我校附属医院援外医疗队员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说,

援外医疗队员克服了很多困难,他们的业务素质过硬、内心坚强。每个队员都有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还会延续下去。(下转第2版)



近日,我校各选举单位陆续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本单位出席中共复旦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截至5月29日,全校出席学校党代会的代表都已选举完毕,名单将于近期正式公布。图为5月27日,基础医学院选举出席中共复旦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校法学教育迎接百年探寻转型发展之路

本报讯 在我校法学建立百年之际,“法学教育转型发展峰会”于5月28日举行。来自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慕尼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的20余位法学院校的校长、院长出席峰会,并就中外法学教育的转型与创新开展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复旦法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伊丽莎白·麦吉尔担任该委员会的首任联席主席。

当天,法学院还与上海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涉医法律问题研究、医事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发挥同学校科优

势,加强学科融合与交叉。据了解,学校还将在此基础上探索联合培养相关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力争为国家培养更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复合人才。

法学院院长孙笑侠介绍,当前我国法学人才尽管在数量上存在过剩的问题,但对于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仍持续扩大,能够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法律人才严重不足,法律人才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与国家日益提高的社会公正企盼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这正是大学法学院在人才培养中所必须面对的基本情境和根本目标。

作为我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法学学科肇始于1914年,今年正好是第100个年头。据

悉,我校法学院正以全面贯彻国际化战略为抓手,依托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区位优势 and 复旦大学的综合性学科优势,加快推进法学学科的转型升级和法学教育的跨越发展,大力提高面向未来的法学人才培养质量。

校长杨玉良,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法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主任张文显,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等出席峰会开幕式并讲话。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出席了法学院与上海医学院院际协议签字仪式并致辞。副校长林尚立也在峰会上宣读了法学院第一届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名单并为委员们授证。文/陶韩烁

校庆科学报告会为学生搭建舞台

本报讯 5月28日,第47届校庆科学报告会学生专场在光华楼举行。23组获得2012-2013“挑战学者”荣誉的学生在会上展示了过去一年的学术心路和学术成果。

今年的校庆学术文化周继续弘扬复旦精神和学术传统,恢复了起始于1956年的科学报告会学生专场。学生专场结合由团委每年举办的学生学术报告会,以推进学生参加科研工作为切入点,为科学创新的同学提供交流平台,展示学术成果,培养学生科学素质,鼓励学生追求科学精神。6位获得“挑战学者”荣誉的学生代表登上往日都是学者教授舞台的袁天凡报告厅讲台,进行了口头报告。报告主题涵盖化学、基础医学、计算机、数学、外文、新闻等学科。相关院系的老师也从研究方法、成果意义等角度对报告项目进行了点评。据介绍,“挑战学者”是授予在复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表现突出学生的荣誉称号。

据悉,本次校庆科学报告会学生专场包括两个部分。除口头报告外,持续一天的“丁”字墙报展示也在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展示了更多学生的学术成果。文/毛奕云

研究生教育“重拳出击” 百门 FIST 课将开出

名师教学、集中授课、向社会开放 首批 44 门课程通过专家评审

“FIST(暑期集中式授课)项目”是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即将推出的“拳头”项目。该项目具有几大特点:授课教师为国内外教学科研名师;以夏季集中授课为主;鼓励校内教师跨院系、跨专业开课,允许高年级本科生和已被录取为该校研究生的学生预修;所有课程均计算学分;尝试将研究生课程对外校和社会开放。

我校设立包含百门研究生 FIST 课程项目 (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 暑期集中式授课) 的建设计划,作为现行课程开设的一个重要补充。近日研究生院公布,首批 44 门课程已通过评审,学生近期可以上研究生院网页进行选课。

“FIST 项目”是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即将推出的“拳头”项目,旨在建设一批高质量研究生开放课程。与已有课程相比,该项目具有几大特点:授课教师为国内外教学科研名师,我校教师负责组织;以夏季集中授课为主;鼓励校内教师跨院系、跨专业开课,允许高年级本科生和已被录取为该校研究生的学生预修;所有课程均计算学分;尝试将研究生课程对外校和社会开放。此外,还将对跨校区、专业学位类、本研衔接以及公共政治、公共英语等课程予以特别支持。

4 月 18 日、23 日,研究生院分别举行 2013 年度第一批研究生课程“FIST 项目”的审议、医科专家评审会,评审通过了 44 个项目。

此次通过第一批“FIST 项目”评审的 44 门课程,包含 18 门文科课程、14 门理科课程、7 门医科课程及 5 门跨校区、学科或公共学位课程。课程涵盖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学、新闻传播、艺术、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力学和医学等多学科领域;还有政治英语等公共必修课,以及英文写作 SCI 论文、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公选课。

已确定的授课教师中,有菲尔兹奖获得者 1 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美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5 人;973 首席专家 2 人;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

划)专家、校首席教授等 50 余人。

教学形式将更具创新性探索。在课程中更加注重学科基础和前沿问题的平衡,鼓励采取多媒体技术、互动式、讨论班等多种教学形式,基础性强且内涵丰富的课程,其授课时间可适当延长,并有课外阅读量和考核的要求。某些课程可对社会开放,更重视教学对象的需求,增加课程效益,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个性化发展对研究生课程的需要。

FIST 项目的评审标准较高,程序规范。学校从 3 月 12 日开始接受意向申报,历经专家初审、正式申报、项目专家答辩,最终 44 项课程通过评审,将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负责评审的很多专家本身就是各引领领域学术带头人。朱立元、戴鞍钢、陈其荣、倪世雄、姜波克、梁鸿、施伯乐、洪家兴、范康年、周鲁卫、卢大儒、朱虹光、汪玲、程训佳、钱睿哲、周国民和邵云增等名教授对申报课程逐项进行审议及论证,使试点项目更趋完善。

研究生院院长钟扬介绍,“FIST 项目”的设立与实施,是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在前期开展全校各院系调研的基础上,针对现实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设置的。它是具有跨学科、跨校区和一定社会开放性的“拳头”或核心课程建设项目。它是现行课程开设的一个重要补充形式,是建构本校特色研究生课程和教学体系、更新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内涵建设举措。同时也是适应时代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改革尝试,学校力争今年暑期能开出一批高质量研究生课程,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

据了解,第一批项目的简况和报名表已于 5 月上旬登陆研究生院网站。第二批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将于 6 月开始。

文/廖文武 姚玉河 包晓明

(上接第 1 版)他指出,在新形势下,援外的模式和方法也应有新的发展。他强调,在援外过程中,除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还有服务国家和文化传承。援外医疗无疑是大学及附属医院服务国家的重要体现之一;同时,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也要重视总结和凝练文化,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他希望援外医疗队员在学校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推进全球健康研究方

面发挥更多作用。

校庆学术文化周自 5 月 21 日开幕以来,在全校范围进行了非常活跃的学术交流和展示。校庆期间举行全校性学术文化活动,是我校的优良传统。每年的学术文化周都以座谈会形式闭幕。今年,学校以纪念国家援外医疗 50 周年为契机,组织该场座谈会,弘扬复旦医科崇高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复旦优良文化传统。文/张婷



近八百名 2003 届校友返校共续同窗情

6 月 1 日,2003 届校友返校日活动在江湾校区举行。近八百名校友携家属重返母校,共续同窗师生情谊。2003 年时任校长的王生洪教授出席大会并致辞,副校长冯晓源为校友介绍学校发展和规划。据介绍,2012 年 6 月 2 日,我校校友会首次举办以毕业十周年校友为主体的全校性返校活动,今年是第二届。图为校友抱着自己的“复二代”在母校校园留影。

文/徐驭尧 摄/石渡丹尔

基层党建之窗

“新”媒体做抓手 “心”建设显成效

我校新闻学院每年有近 40% 的同学参与海外交流学习,加强海外党员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海外党员组织生活,是党建工作中的新问题、新考验。

伴随 2012 年初胡锦涛访问奥地利,在奥海外党小组开展“‘新’媒体,‘心’建设”主题组织生活。以“新媒体”通讯手段为抓手,及时跟踪了解海外党员思想波动,充分发挥海外党小组积极性,线上发起讨论、线下组织座谈、国内党支部远程支持,构建海外党小组考核质询机制,从而在思想、组织、制度建设上实现创新突破,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日前,新闻学院硕士生党支部获评“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 2012 年度最佳组织生活案例”。

据介绍,2011 年底,新闻学院海外党支部获悉胡锦涛总书记赴奥地利萨尔茨堡访问的消息后,通过微信、飞信、QQ 等通讯手段,提醒所有在欧洲交流的党员开展相关学习活动。2012 年初,随着胡锦涛总书记成功完成对奥访问,海外党员在 QQ 群中展开专题讨论。

面对一些分歧性话题,海外党小组组长李楠针对网络讨论不及时、不彻底的特点,在萨尔茨堡大学组织现场座谈,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另一方面,海外党支部积极同国内党支部取得联系,搭建海内外沟通平台,让国内有经验的老党员作为“顾问”,通过 skype 电话会议,参与到现场讨论中来。

与国内党员相比,海外党员

管理具有“学习相对集中,居住地点分散,时差不易协调”等特点。支部创新海外党小组考核机制,建立和完善“三个一”海外党员定期汇报制度:党员每个月向支部做一次书面思想小结;党小组组长每个月至少组织一次线下组织生活;支部委员会每季度抽查一次海外党小组工作,全体海外党员接受支部大会质询,回答相关问题,形成海外党小组考核质询机制。

据了解,目前,支部 QQ 群已累计分享 1500 余万字学习资料,微博发起讨论十余次,海外党员上交个人思想汇报数十篇。

从长期来看,海外党小组管理制度的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党的思想建设,真正做到“不让任何一个党员漂零海外”。

学生心目中的十佳“好老师”“好导师”出炉

本报讯 5 月 29 日,研究生院、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举办第五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表彰座谈会。副校长陆助出席。“好导师”评选活动从 2004 年开始,两年一届。此次 10 位导师获“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26 位导师获提名奖。

文/曾艺倪 又讯 校党委学生工作部近日在全校本(专)科毕业生中开展“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活动。10 名老师获“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16 名老师获提名奖。文/陈昶安

2013 届本(专)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于 瀛 (材料科学系)
雷 杰 (化学系)
姚一隽 (数学科学学院)
王海涛 (高分子科学系)
陈文婷 (基础医学院)
侯晓远 (物理系)
陈治东 (法学院)
叶德泳 (药学院)
梅若艾 (生命科学学院)
蔡先聪 (新闻学院)

第五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朱立元 (中国语言文学系)
童 兵 (新闻学院)
陈明明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郭 建 (法学院)
马 红 (生命科学学院)
郑耿峰 (先进材料实验室)
程训佳 (基础医学院)
葛均波 (中山医院)
张文宏 (华山医院)
顾 勇 (第五人民医院)



统一思想定目标 振奋精神聚力量

中共复旦大学历次代表大会回眸

中共复旦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1956年9月)

1956年9月29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教学和科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为建设更加切合我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等教育制度而贡献力量;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不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尽力创造教学与科研的必要条件。

中共复旦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1958年3月)

1958年3月23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工作报告提出日后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培养的学生要符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要求;科学水平上要适应“大跃进”的要求,真正为生产服务,要使主要学科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争取一切工作都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

中共复旦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1960年2月)

1960年2月1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全校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乘胜前进;要求全校共产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猛攻尖端,攀登科学高峰,为把复旦大学办成先进的大学而奋斗。

中共复旦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1961年12月)

1961年12月24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要求进一步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实现规划要点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工作,为不断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更好地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

中共复旦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1962年12月)

1962年12月28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要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执行高教“六十条”;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向的指导下,对全体师生员工加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努力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提高科学水平,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中共复旦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1964年3月)

1964年3月29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全校共产党员深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群众前进;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又红又专,为完成学校的工作任务而共同奋斗。

中共复旦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1966年1月)

1966年1月14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全校共产党员深入地认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大意义,积极、自觉、认真、持久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中共复旦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1970年8月)

1970年8月8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产生第八届党委会。

中共复旦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1981年1月)

1981年1月29日,中共复旦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为,“要把学校办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切实地改进党的作风。”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1986年5月)

1986年5月9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原则同意《复旦大学“七五”事业发展规划(草案)》,建议将《复旦大学“七五”事业发展规划(草案)》提交复旦大学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91年6月)

1991年6月13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导思想及中心议题是:遵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四中至七中全会的精神,在巩固学校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动员全校共产党员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总结近几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学校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加强党在学校的领导地位,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群策群力,推进学校各项改革,为实现学校“八五”事业发展规划而努力奋斗。

2000年4月,原复旦大学与原上海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复旦大学,组成两校合并后的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2001年9月)

2001年9月16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十年来党委领导学校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和认识当前学校面临的形势,明确今后学校工作的基本任务,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动员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师生员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为促进“十五”期间学校的更大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而奋斗。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三次代表大会(2006年9月)

2006年9月23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和讲话精神,动员全校共产党员和广大师生员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报告主题	当届党委书记、副书记	党员数	代表数
中共复旦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	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力量,为提高教育质量、繁荣科学研究而奋斗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	855	172
中共复旦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	坚持党的领导,吸取经验教训,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陈传纲	858	225
中共复旦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正确处理学校工作的各种关系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陈传纲、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邹剑秋	939	187
中共复旦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	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陈传纲、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	1392	279
中共复旦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	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贯彻高教“六十条”,为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奋斗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陈传纲、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	1274	179
中共复旦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深入社会主义教育,努力革命化,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	书记:杨西光 副书记:陈传纲、王 零、郑子文、徐常太、邹剑秋、刘 洁、葛林槐	968	194
中共复旦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走毛泽东思想的路,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奋斗	代理书记:王 零 副书记:郑子文、徐常太、刘 洁、葛林槐	1135	227
中共复旦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	加强党的建设,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大学而奋斗	书记:方耀华、侯赞民 副书记:张国权、刘 洁 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复旦大学党委会成员中,第一书记为夏征农,第二书记为王零、盛华,副书记为郑子文、徐常太	1057	198
中共复旦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复旦大学办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	书记:盛 华、林 克 副书记:郑子文、袁成福、李 强、陆庆壬、金炳华	1790	233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	巩固整党成果,不断改革创新,为实现我校“七五”事业发展规划而奋斗	书记:林 克 副书记:陆庆壬、宗有恒、王荣华	2378	272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加强团结,振奋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奋斗	书记:钱冬生、程天权、秦绍德 副书记:宗有恒、王荣华、程天权、秦绍德、赵衍盛、张济顺、翁铁慧 2000年两校合并后的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成员中,书记为秦绍德,副书记为彭裕文、张济顺、翁铁慧、钟家栋	2059	257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而奋斗	书记:秦绍德 副书记:彭裕文、翁铁慧、钟家栋、燕 爽、陈立民	8477	293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内涵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	书记:秦绍德 副书记:燕 爽、陈立民、刘建中、王小林	13500	276

(本报涉及数据来源《复旦大学百年志》、《校史通讯》)

◎相关链接

党代会基本知识 Q&A

Q:何为党的代表大会?

A: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组织的领导机关,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党的基层代表大会。

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Q:何为党的代表大会代表?

A: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按照规定的程序,经过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党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决定,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是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职权的主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必须保证代表大会代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党章规定党代表实行任期制,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

Q:党的选举制度是怎样规定的?

A:党的选举制度是由党章和有关文件规定的选举产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制度,包括党内进行选举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方法和有关规定。

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作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Q:党内选举方式有哪些?

A:党内选举方式是党内选举时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主要有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差额选举、等额选举和预选。直接选举是指有选举权的人直接参加选举行使选举权利的选举方式;

间接选举是指有选举权的人通过选出的代表进一步行使选举权利的选举方式;差额选举是指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选举;等额选举是指候选人与应选人数相等的选举;预选是指在党内选举时,为确定正式候选人而进行的选举。

Q:党内选举的程序是怎样的?

A:党内选举的程序是党内选举的具体规则 and 实际工作步骤,主要包括选举单位的划分、候选人酝酿提名、产生候选人、介绍候选人情况、规定投票方式和当选票方法、进行选举、公布选举结果和确定当选人等。上述各个程序,不是党内所有选举工作都必须完全采用的程序。

党代会或党员大会的选举程序一般是:宣布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数、缺席人数,并说明会议是否有效;宣布选举内容并由大会举手通过选举办法;举手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检查票箱,核实人数,领取、清点、分发选票;说明填写选票的注意事项后,填写选票;宣布投票顺序和进行投票;宣布清点投票和选举是否有效;进行计票;由总监票人或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由大会主持人宣布当选人名单。

爱无国界 不辱使命 白衣天使书写半世纪辉煌

自1963年4月6日,我国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起,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援外医疗的序幕。1965年5月,我校附属华山医院潘银英医生、华东医院顾同进医生、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巫善明医生前往索马里开展援外医疗工作,成为我校附属医院中最早的援外医疗队员。

50年来,复旦大学(含原上海医科大学)直属(6家)及非直属(5家)附属医院共派出援外队员197人次,前往非洲、亚洲及大洋洲的11个国家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受援国分别为摩洛哥、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多哥、马里、乍得、布隆迪、柬埔寨、老挝、泰国、瓦努阿图。

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共计组建和参与60余批次援外医疗队。其中,中山医院派出54人次,华山医院派出35人次,妇产科医院派出17人次,儿科医院派出13人次,眼耳鼻喉科医院派出22人次,肿瘤医院派出2人次,金山医院派出10人次,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派出10人次,华东医院派出24人次,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派出8人次,浦东医院派出2人次。派出医疗队员中近三成派出时为副高级以上(含副高级)职称,近四成为女性。

自1975年起,上海对口援助摩洛哥。目前,附属医院还有9名医生在摩洛哥的塞达特及拉西迪亚开展援外医疗工作。

50年来,我校附属医院广大援外医疗队员牢记党和祖国的重托,在受援国救死扶伤,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展现出患者所急需的高尚医德、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精湛过硬的业务素质,救治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赢得受援国上下交口称赞,为增进我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友好作出了杰出贡献。与此同时,队员们也积极向我国驻受援国使领馆工作人员等提供治疗、体检等医疗服务和保障,成为我国对受援国外交工作强而有力的后盾。我校各附属医院援外医疗队员用自己的严谨和奉献,用许多平凡但又不平凡的故事,书写着一幅壮丽的复旦援外医疗历史画卷。



受援国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相对缺乏,援外医疗队员时常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手术。

王国民:

悬壶之情,赤子之心

中山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摩洛哥,1991.3—1993.4

在摩洛哥塔扎分队,王国民担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两年多里,他带领队员克服当地政局动荡、医械缺乏、气候炎热、缺水少电、疾病流行、通讯不便等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展工作,废寝忘食抢救当地危重病人。

1992年7月下旬的一天,当地有个名叫Abdenf的12岁孩子不幸被马踢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时间就是生命,送至医院后,王国民顾不得大汗淋漓及时对其进行了诊治。孩子经抢救终于转危为安,在医生们的悉心照料下于8月8日痊愈出院,当时摩洛哥的医务人员和病人都望着他说,“中国医生救了这个孩子,中国医生好!”

9月,塔扎省卫生厅长紧急召见王国民,向其询问中国医疗队能否接收一位病人。原来这名病人一周前被高压电击伤,曾在一家灼伤中心住院诊治,但已患脓毒血症,四肢坏死生命垂危。由于队里没有灼伤专科医师,略微犹豫之后,王国民毅然决定收治这位病人。全队上下通力合作,共同制定治疗方案,对病人进行二次手术,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中国医生成功了!此后,王国民为一个患膀胱恶性肿瘤的病人成功做了膀胱大部切除和右侧输尿管移植术,这在塔扎省尚属首例,中国医疗队的名声遐迩皆知。

据统计,塔扎队12位医务人员,8个科室的门诊数就达16万人次,急诊数1.3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约

9300人次,总共做了大小手术约4700台,抢救危重病人近200例。

医疗队内部的管理工作是开展医疗业务和外事交往的基础和保证。医疗队在沪脱产培训和学习法语期间,王国民逐个与队员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需求,并及时向医院领导提出意见建议,做好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医疗队抵摩进塔扎点后,王国民带领大家完成新老队交接工作后,立即着手进行安定生活、熟悉医疗业务等部署安排,制定各科室的工作规划和制度,组织时事政治学习。由于他们进点后的准备工作做得及时充分,全队的各项工作很快就顺利开展起来。

“人在国外,心系祖国。”1992年6月,当塔扎队员们从报纸上获悉祖国有十八个省市正遭受自然灾害后深感焦虑不安,大家立即商定,从很少的伙食费中节省下钱来捐款救灾,表达他们的一腔赤诚。

邵云潮:

身在医门好修行

中山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泰国,2004.12—2005.1

“说实话,在那样一个紧张的过程中,我心里从来没有过害怕或退缩之类的念头。”

2004年12月30日上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医生邵云潮刚刚结束科室例会,安置好一个环枢椎脱位的高危病人欲前去做餐,突然接到主任陈统一的电话,安排其作为中国援泰医疗队队员立即赶往当地。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婆那边需要做点解释,因为我刚从英国

回来一个月又要离开。”“她说你去去吧,国家需要你,医院让你去也是你的光荣。听她这么说我感觉如释重负。”准备出发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两点,邵云潮还来不及与没放学的女儿告别。

三点半,中山医院援泰队员集中,六点钟于浦东机场起飞,其间包括签证等一系列事宜全部加急。

因为海啸突发,邵云潮一行抵泰后,当地情况较乱,领事馆主要精力放在确认游客伤亡上,“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要呆多久,但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然来了就把事情做好。”据邵云潮描述,灾难过后因尸体堆积烈日曝晒形成的恶臭相当反胃。“但必须忍受,实际上我们医生早已有过太多类似体验。只不过国内做一场的伙食费中节省下钱来捐款救灾,表达他们的一腔赤诚。”

普吉岛属较小的行政单位,应对突发状况时医生配备极其紧张,诸如瘟疫等传染病爆发的可能性很高。“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瘟疫,不过真的没想太多。”

每天,队员们早上四五点就要出发,泰国地属热带,清晨气温尚不太高。驱车单程需要4小时,晚上十点才能回旅馆,路途劳顿,休息不足。

邵云潮一行和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配合,先后深入三个难民点、三家医院、一个社区和一所学校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全面评估当地环境,喷洒消毒药水,提出了加强灾区饮水卫生、食品卫生和消毒隔离等具体措施的建议,受到泰国卫生

部门的高度重视,次日就将其付诸实践。此外,医疗队还承担了包括切除肿块等三台规模较小的常规手术。“在泰国,一切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无法预知。”邵云潮说。

顾宇彤:

只要是挑战就去尝试

中山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摩洛哥,2008.10—2010.10

对于骨科医生顾宇彤来说,在荷塞马度过的两年是意义非凡的。在这两年,他学会了法语,在艰苦的环境下做了很多手术,和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他还成了一名“作家”,将荷塞马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

鼓动顾宇彤去摩洛哥援外的工场简直是太好做了,据他自己回忆,也就是午饭时候接了个电话,然后晚睡。”他表示,由于吃不惯当地的食物,10天内瘦了十斤。

普吉岛属较小的行政单位,应对突发状况时医生配备极其紧张,诸如瘟疫等传染病爆发的可能性很高。“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瘟疫,不过真的没想太多。”

每天,队员们早上四五点就要出发,泰国地属热带,清晨气温尚不太高。驱车单程需要4小时,晚上十点才能回旅馆,路途劳顿,休息不足。

邵云潮一行和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配合,先后深入三个难民点、三家医院、一个社区和一所学校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全面评估当地环境,喷洒消毒药水,提出了加强灾区饮水卫生、食品卫生和消毒隔离等具体措施的建议,受到泰国卫生

部门的高度重视,次日就将其付诸实践。此外,医疗队还承担了包括切除肿块等三台规模较小的常规手术。“在泰国,一切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无法预知。”邵云潮说。

找不到最合适的材料,只有绞尽脑汁想办法。由于医生少,手术室里也往往只有一名医生,最多再加一两名护士。顾宇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共完成大大小小各种手术近四百台,有时候朋友晚餐聚会,他还驱车去隔壁镇子的医院做手术,忙好了就躺在大街上看星星,感慨一下自己又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010年5月,经外交部、卫生部的批准,受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商处及中国援摩医疗总队的委派,顾宇彤前往安哥拉抢救一名遭遇车祸后颈椎骨折四肢瘫痪的中国雇员,事后上海铂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致函中国援摩医疗总队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2010年9月下旬,顾宇彤还利用公休时间前往南部沙漠的扎古拉省参加援摩医疗总队组织的巡回医疗活动,看门急诊69例,完成大小手术共15例,9月24日连夜抢救并手术治疗1例多发性骨折、脱位患者,并获得摩方极高的评价。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就会特别努力去做。”顾宇彤对自己这样评价。一般而言,摩洛哥的病人疑难杂症比在国内医院接触到得要少,医术的进步速度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顾宇彤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理论知识,坚持“一有手术就去做”的想法。在摩洛哥工作期间甚至还能取得“发表中文论文和SCI英文论文”(影响因子1.825)各1篇,另有1篇中文论文修回,还有1篇英文和2篇中文论文正在审稿中”的学术成绩。

在摩洛哥期间,顾宇彤每两三天就会写一篇博客日记,记录在摩洛哥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国后他将自己的博客日记整理成书出版,题为《我在摩洛哥当医生》。在书中可以看到他对工作的热忱,对病人的关心,以及对医患关系的认知。

林善谔

用真情换真情

华山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阿尔及利亚,1972.4—1974.8

1972年4月29日,上海医疗队搭乘国际航班,经由巴基斯坦、缅甸、埃及、法国,于5月1日到达阿尔及利亚。抵达后,林善谔立即被抽调到湖北省医疗队服务的赫利赞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和湖北队医生一起,担负起赫利赞医院的医疗任务。

援外医疗队医生的工作负荷很重。每天上午七点开始查房,一个医生管64张病床。每个礼拜医疗队的医生要去三次阿尔及利亚最穷的农村去看门诊,还带去许多药品。“天气很热,我们靠近撒哈拉沙漠,室外温度最高的时候都可以达到六十度。”

有一个医疗事件,是林医生这一生的遗憾:“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个老人的面貌,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当时送进来的时候不断地说:‘医生,救救我。我还有六七头羊,救救我,我把它们全部送给你’。当时这位老人是消化道出血,之前也有过相关的病史。”林医生给出了非常清楚医嘱:输盐水、输血。但是第二天去查

房的时候,这位老人已经与世长辞。原来,助理护工在输血时针头没有固定好,半夜里错位,血液没有进入血管,失血过多而死。”老人家的面孔还是很慈祥,我想他当时肯定是在默默地忍受这痛苦啊。”

1973年非洲爆发大规模的霍乱。林医生所在的医院就在沙漠边上搭了三个帐篷;第一个是临时医院,第二个是医生休息住宿的地方,最后面的就是排放病人尸体的地方。援外医生在这场霍乱中救治了大量的阿人民,林医生一人就收治了600多病人,仅20多人因病情太重,救治无效死亡,其他的全部存活。

阿尔及利亚当时的医疗能力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中国医生还承担起了培养当地医护力量的任务。中国医生成立了“急救培训班”,手把手教授助理护工做心肺复苏、脱水等急救医疗手段。

医疗队在阿备受尊敬。阿尔及利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不杀生。看到医疗队员们生活实在是太过艰苦,阿宪兵队的成员允许医疗队员下河捕鱼,还允许在使馆交免税香烟。当时援外的不仅有医疗队还有打井队、修路队等,但是其他援外队伍和当地发生矛盾时候,出面调停的往往是医疗队。

何劭:

非洲的病人感动了我

华山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摩洛哥,2008.10—2010.10

何劭医生所在的城市是荷塞马,援助医生在当地的默罕默德五世省立医院开展援助。即便是省立医院,就只有200张床位,何劭形容“这里的医疗条件也就相当于国内的社区医院。”由于上海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定点援助摩洛哥,这里的医护人员和居民还会说简单的上海话,“依好哇”,“依今天辛苦啦”,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沪语,内心很是感动。

摩洛哥的通信网络建设不是很完善,网络时断时续,通话不通畅且昂贵。曾经有一位援外的老医生每天要把唯一的中文频道CCTV4的节目看四遍,借此缓解思乡之情。“想着法子充实自己,总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一闲下来就觉得难熬。”

何劭所在的普外科只有两名医生,实行两两轮换体制,这导致一个医生值班的时候就要做所有的事情:“一般手术和门诊量很少,多是急诊,每晚都有两三班,但都是刀刺伤、驴蹄伤、车祸、阑尾炎。”在摩洛哥,药品、医疗消耗品都需要在外面的药房购买,医院的设备很简陋,钩子没有,镊子是钝的。唯一的一台高科技医疗设备——在国王生日时受赠的腹腔镜,因为医院的摩洛哥医生不会用被困置了三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开展了腹腔镜手术”,这才让这台腹腔镜派上用场。

摩洛哥的护士基本上都是具有二十多年以上工龄的男护士,很有经验。但是,做手术的时候只有一名护士,并且只会帮医生把肚子拉开,其他的就全靠医生了,“每次真想自己多生出几双手出来。”何劭说。



1993年,医疗队员在摩洛哥塔扎医院眼科门诊为当地病人诊治。



2005年,外国医生与援外医疗队员交流中医针灸技术。



2006年,医疗队员在驻地医院病房查房。

援外期间,摩洛哥患者带来的感动,使他越发意识到:“医生不该那么鲁莽、坚决地把一些病人回绝掉,多一点解释,可以舒缓他们紧张的情绪。”

在援外的最后半个月里,何劭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获知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快垮掉了……”谈起这件事,何劭一度哽咽。事情发生后,复旦相关领导非常重视,复旦学子们也积极帮助捐献血小板。好在,何医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康复三年。

孙道开:

代表自己,更代表祖国

儿科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柬埔寨,1975.7—1977.10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柬埔寨正在进行全面建设,包括医疗事业在内的很多方面都缺乏专业人才,孙道开医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去的柬埔寨。当时孙道开刚大学毕业,有了几

年工作经验。在柬埔寨,每天他一个人管理医院里的四五百个病人,虽然配有两名助手,但仍感到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这也迫使他想出了一种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把重病患者集中到一起,集中力量诊断治疗,解决时间上来不及的问题。

除了工作上的繁重任务之外,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吃穿住行对中国的援外医生来说也是一大挑战。柬埔寨气候炎热湿润,当地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有时大家只能开几个罐头来改善一下伙食。虽然在北京接受过语言培训,但初来乍到,语言交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经过自己的摸索和不断交流,他三个月基本就能听懂当地人说话,六个月就能与病人熟练地对话了。

在柬埔寨的两年,让孙道开深切感受到当地痢疾、登革热等热带传染病的易发程度,就连他自己也未能幸免。他当时得过持续一周左右时间的登革热病,发烧、挂盐水,那段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幸

之后的6月,当地又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驻扎地断水1-2天,后来通过当地的消防车运水才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治疗及时,最后并无大碍。

在外两年,孙道开时常想起家的温暖。由于通讯不便,一个月才与家里通一次信。柬埔寨的阳光很强烈,自己的视网膜膜也出现了问题,这些都不能和家里谈起,以免家人担心,得登革热的事更是只字未提。

在去援外前,孙医生已有了几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经验,但在柬埔寨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他说,柬埔寨的很多病例以前在国内都没碰到过,只能一边治疗一边学习。他随身带了一本当时国内最厚的儿科教材,有空闲时间就不时地翻翻此书,当时的医疗环境也不得不迫使自己那样去做。柬埔寨当地也有不少外文版的医学书籍,可以供自己学习参考。孙道开骄傲地说,在国内自己是一位儿科的专科医生,而在柬埔寨时他可是儿科的全科医生,什么病都看得着。

陆毅群:

摩洛哥人民非常友好

儿科医院援外医疗队员
摩洛哥,2002.10—2004.10

陆毅群所在的医疗队驻扎荷塞马,离首都只有10小时的路程,其中3个小时汽车是在盘山公路上行驶的。那里的工作也比较繁忙,特别是他所在的小儿外科,除了保证每天的正常工作外,当地医院还实行一星期值一次班的急诊工作制度,在这一星期内必须24小时需随叫随到。

摩洛哥是伊斯兰社会,饮食有不少禁忌,能吃的食物也不像在国内那样方便地得到。医疗队员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当地允许的情况下,在居住地旁边划出一块地,种了一些蔬菜,养了一些家禽,平时能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当地的水质也不是特别好,倒出来的清水不一会就会有类似盐碱的沉淀物,所以那时只能喝当地的矿泉水。住的环境也不如人意,住房是由病房改造的,所以开玩笑说,上海去的医生也是住“病房”的,12个人还得轮流使用一个浴室。

2003年2月摩洛哥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源离驻地20多公里,当地死了300多人。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很多急救伤员都转到陆毅群援外所在的医院进行诊疗。地震当天晚上,医院的墙上都被震出了裂缝,为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陆毅群他们就在室外安全的地方搭起帐篷进行治疗,自己也住在帐篷里。

陆毅群说,当时中国医生在震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抢救病人,震后的第一例手术也是中国医生做的。他也坦言,当时家人知道地震的消息后都非常担心,况且自己的小孩才两岁不到,父母都已七十岁了,身体也不好。但当初医院号召去援外医疗,自己虽因家里的情况而有所犹豫,但最后还是踊跃报名参加了。

之后的6月,当地又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驻扎地断水1-2天,后来通过当地的消防车运水才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9年,摩洛哥国王和部分中国援摩医疗队队员及摩洛哥当地医院医护人员在一起。

五十载接力：友谊“长虹”跨越万里

方芳：

敬业精神为当地人所惊叹

妇产科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6.10—2008.10

方芳所在的援外医疗点是位于摩洛哥最北端的荷塞马省，三面被里夫山脉所环绕,交通十分不便,每次出行都必须翻山越岭四、五个小时,这里缺乏绿色蔬菜，肉制品中的牛羊肉产品都非常贵,单一的饮食让人难以接受。令方芳没有想到的是，医疗药品、设备、环境之差更是让人咋舌;扣不牢的血管钳、剪不动的组织剪、大小小粗细不合适的缝针缝线，电刀也难得找到一把适用的,没有胎心仪,只能用木听筒听胎心。甚至连产妇分娩的消毒纱布也缺,只能用产妇带来的旧布。

“所有的情况,在国内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方芳依旧唏嘘不已,“不过，这种落后的条件也是对我十几年临床经验的考验。”在荷塞马的两年时间,方芳治疗了许多严重的产科合并症及并发症,其中有不少是在国内罕见甚至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特殊病例:子痫、好娠子宫颈破裂、胎盘早剥子宫卒中、忽略性横位、无脑儿、髂位脑积水等,专业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锻炼。两年里她经手的所有患者均得到良好的治疗,未发生1例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及手术并发症也明显低于以往及周边地区,得到省卫生厅及医院负责人的赞许。

“虽然医疗条件简陋,资源缺乏,但还是争取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多快好省地开展工作。”方芳在她的博客——《情系荷塞马》如是写道。

除了一些小型卫生所和私人诊所外，整个荷塞马省只有这一家公立医院,而中国医生承担了医院大部分的专科医疗工作,方芳所在的妇产科只有3名医生。由于当地对生育的不限制以及避孕观念的缺失,妇产科每月分娩数少则三百,多则四、五百,此外,还有妇科门诊急诊及手术,所有医疗工作都由3名医生和约20名护士承担。方芳回忆说,繁重的工作常常让人忙上半天都没空倒口水喝,晚上躺在床上总是感到腰酸背痛。医疗队宿舍在医院三楼,而楼下就是精神科病房，经常会有各种喧闹

声,加上妇产科夜里急诊多,通常睡眠不足。

临回国之际，一位产房清洁工突然摘下自己的项链,执意要送给方芳,“我和她共事两年，我不懂阿拉伯语,她不会法语，彼此几乎没有过语言交流,每次遇见都是用微笑来打个招呼。一根银项链对于她来说，也许她是她身上最珍贵、最值钱的东西。”方芳说到,“真的很感动，这是真正的礼轻情意重。”

尹华：

赴外工作“牺牲”是值得的

肿瘤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6.10—2008.10

在麻醉医师尹华的记忆里，两年援摩的“基调”是两个字：“牺牲”。“不论是家庭还是个人，都需要作出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定牺牲。援外医疗到摩洛哥，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来到非洲的摩洛哥工作，而且又是在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这对我们上海医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艰苦的磨炼。”在尹华的回忆中，临别赴摩时候的情景甚至有些慷慨悲壮。

尹华所在医疗队的工作地点是摩洛哥最北端的偏远山区荷塞马省。去荷塞马之前,前几批医疗队的麻醉医生曾告诉尹华:当地医院的那位麻醉医生兼代理院长相当傲慢,对中方队员不是很友好。后来,尹华所在的医疗队刚到荷塞马时,他也不叫尹华名字,而是简单称尹华为“中国人”,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对尹华、对医疗队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凡事都很尊重尹华,并经常主动关心尹华和医疗队的工作及生活,还请全体队员到他家做客。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尹华以及医疗队员们扎实的医疗工作基础上。

为此，尹华感慨道:“虽然我们在这里工作很辛苦，但我们所做的一切使这里的医生对中国医生的看法有所改观,这令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所付出的也值了。”

两年时间，尹华做了许多麻醉手术,她所在医疗队所做的麻醉手术是整个驻摩医疗队中麻醉种类最多的,她也因此得到了摩方的高度评价。

袁雅生：

几乎每一天都是工作时间

耳鼻喉科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6.10—2008.9

2006年年初,上海市卫生局开始组织新一批援外医疗队。当文件传达至耳鼻喉科医院时,当时年仅34岁的耳鼻喉科医生袁雅生刚刚博士毕业后留在医院工作，身为共产党员并曾经担任医院研究生会主席的袁雅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在艰苦条件下锻炼自己的机会,于是,他第一个报名参加此次援摩任务。

谁也没有料到,临行前的半年里,袁雅生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袁雅生谢绝了学校医管处和医院提出的退出援外队伍的建议，带着牵挂和伤痛毅然踏上了援外的征程。

袁雅生工作的穆罕默德五世荷塞马省立医院承担着当地近13万人口的医疗服务工作,然而,这所皇家医院因为交通闭塞，原来仅有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已经在半年前离开了。袁雅生的到来,改变了医院的现状,成了医院里唯一一名耳鼻喉科医生，被医院寄予非常大的希望。因为医院没有口腔科，医院领导希望袁雅生能身兼耳鼻喉科医生和口腔科医生两个职位。于是,医院耳鼻喉科和口腔科的门诊、急诊以及病房的所有患者的就诊和手术工作全都落在了袁雅生的肩上,他每天都是工作日。他说:“每时每刻都紧张着，碰到问题没有人可以商量,更没有人替代我的工作,就算生病了也要挺着去上班，就像一个每时每刻都紧张运转的时钟。但是这样的生活,让我在紧张的同时,发挥着生命最大的能量。”

刚开始由于医疗设备简陋，袁雅生从常规的手术做起:如扁桃体切除、鼻息肉摘除、声带息肉摘除、鼓膜修补术、甲状腺切除等;三个月后袁雅生就地对取材,开创性地开展了唇腭裂修补、头颈部巨大恶性肿瘤切除与修复、外伤性鼻中隔偏曲和鼻腔闭锁修复整形、气管食管异物取出术、鼻腔鼻窦的内窥镜等手术。

一天深夜医院急诊来了一名因工伤而导致颈总动脉合并颈内静脉和迷走神经断裂的年轻小伙子，他被送至医院时,血压已经降到零,所有的人都不再抱有希望。然而,袁雅生一边吩咐立即输液和配血，一边迅速果断实施了手术。在麻醉科和摩方医护人员的协助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袁雅生成功地找到了颈总动脉断裂处,进行了吻合,然后为之输血和升压抢救。最终,奇迹发生了,病人逐渐恢复了生命迹象并在一周后康复出院。整个医院轰动,因为这在摩洛哥是首例,家属、医生护士们纷纷称袁雅生为“摩洛哥病人的守护天使”。

袁雅生抢救颈总动脉断裂获成功这个事例受到了广泛关注，因为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病例抢救的成功率也低于1%,然而袁雅生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做到了。他得到了荷塞马省卫生厅、医院和当地人民的充分肯定,当地《荷塞马省报》等主流媒体整版报道，阿拉伯大都市网络也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

此外,除了正常在医院上班外,袁雅生还多次去孤儿院探望孤儿和聋哑儿童、参加院内外学术交流,同时参加了由摩洛哥红十字会组织的专为山区贫困失聪老人免费提供手术的巡回医疗活动。

由于工作出色，袁雅生受到了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接见，并被荷塞马省卫生厅授予“特殊贡献奖”，为中国医务工作者赢得了荣誉。

1965年6月,卫生部指派上海市卫生局组建首批援助索马里医疗队。曾担任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公立临床中心、市公卫临床中心)院长的巫善明,时年28岁,传染科主治医师，参队援助索马里的博莱特温州医院,历时两年半。

“1965年，索马里因遭遇连年旱灾，舍马克总理向中国政府要求提供医疗援助,周恩来总理批准:上海组建医疗队,援助半年”。而今，已76岁高龄、仍每天坚持专家门诊的巫善明回忆道。

当时在索马里援医的还有美国“和平队”，以及前苏联、意大利、法国

王好平：

有机会要再去摩洛哥一趟

华东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5.11—2007.10

王好平和他的队友们所在的哈桑二世医院是塞达特唯一一所公立综合性医院,担负着近百万人口的常规医疗工作,医疗任务非常繁重。

作为外科医生，王好平日常需要处理大量急诊病人。他是队里唯一的外科医生，每周要连续值班48小时，还要在摩洛哥医生休假时替班。

医院的医疗设施极其简陋，许多常规辅助检查都难以进行，很多时候医生只能凭借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来救治危重病人。2006年初的“宰羊节”期间，一位因车祸导致脾脏破裂、生命垂危的病人被送到了医院，在几名妇产科医生的协助下，王好平凭借多年经验，果断地对病人实施了脾切除手术,成功抢救了这位病人的生命。

2007年7月30日深夜，王好平所在的医院附近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31日凌晨,近30位伤员分批被送至离出事地点最近的该医院。车祸当天，王好平已连续值班三天，格外疲劳。然而,他仍然在急诊室第一线救治病人，与摩洛哥医生一起处理送来的众多伤员。王好平叫醒正在熟睡的中国医生,通知他们前来帮忙抢救。有些医生不顾前一晚通宵手术的劳累,立即赶来投入抢救。在中摩两国医生的共同努力下,20多位伤员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抢救治疗,转危为安。

“2010年摩洛哥出现了骚乱,我当时特别关心……”回国后的王好平还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着摩洛哥,他说有机会一定要再去摩洛哥一趟。

巫善明：

那种艰苦也是人生的收获

公立临床中心援外医疗队

索马里,1965.6—1967.12

1965年6月,卫生部指派上海市卫生局组建首批援助索马里医疗队。曾担任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公立临床中心、市公卫临床中心)院长的巫善明,时年28岁,传染科主治医师，参队援助索马里的博莱特温州医院,历时两年半。

“1965年，索马里因遭遇连年旱灾，舍马克总理向中国政府要求提供医疗援助,周恩来总理批准:上海组建医疗队,援助半年”。而今，已76岁高龄、仍每天坚持专家门诊的巫善明回忆道。

当时在索马里援医的还有美国“和平队”，以及前苏联、意大利、法国

等派出的医疗队。别国的医疗队员一般只需上午上班2、3个小时，下午就各自开起私人收费诊所。“上海医疗队当时奉行全天候医疗援助，并且无偿提供药品、器械,就诊不用付费,所以很受当地官员与老百姓的敬重和欢迎。”说到这里,巫善明非常自豪。

当年的巫善明，胸怀奉献精神与远大志向，在索马里一呆比当时国内公社医院还落后的博莱特温州医院，艰辛工作了两年半。

至于为何将原计划半年的援助延长到两年半,巫善明说,那是因为上海医疗队表现出色，索马里总理和人民不舍得医疗队离开，特意向周总理要求的。

回忆那段难忘岁月，巫善明对于“艰苦”二字的叙述并不多，更多则是表达了一种历练后的自身感悟。用巫善明的话来说,那所有的历练与艰辛,都是一种最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更是一种人生的宝贵收获。

吴静炯：

在摩洛哥当医生感觉真好

市五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4.10—2006.10

吴静炯最初并不是那批援摩医疗队的入选，而是有一名已入选的队员由于一些变故不能成行，医疗队亟需临时补充人选，当时作为骨科副主任的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请缨，解决了即将启程的医疗队的燃眉之急,并受上级领导的重托,担任医疗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

吴静炯和他的队友们工作的医院在远离摩洛哥首都400公里左右的偏远沿海山区荷塞马省。医疗队12名队员分别来自7个原先不同的国内医院,在医疗技术、生活习性、个人素养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这对队伍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此,吴静炯积极营造团结向上、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每位队员感受到医疗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抵达荷塞马后，吴静炯清楚地认识到,中摩医疗常规不同,工作作风迥异，惟有保证医疗安全、提供优质服务,才是医疗队立足的基础。

一天，当地医院院院长的亲戚因摔伤致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该院长指名让医疗队队长吴静炯给予治疗。吴静炯心里明白,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个穆斯林病人的治疗问题,也是证明中国医生、中国医疗队实力的机会，同时还是当地医院代院长对自己医疗水平的现场“考试”。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和细致的术中操作，一个多小时后,在代院长的现场“监考”下,

吴静炯顺利完成手术，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也让摩方医务人员刮目相看。

吴静炯的“好口碑”逐步在当地传开,吸引着越来越多前来就医的患者。而令吴静炯感到自豪的是，当地卫生厅领导和医院医务人员的亲朋好友，包括从欧洲回摩探亲的人员，就医时都慕名要找“中国的吴队长”，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了吴静炯在摩洛哥的好朋友。

近两年时间里，被摩洛哥人誉为“真主派来的好医生”的吴静炯和他的队友们，完成门诊急诊患者诊疗24113人次,住院患者诊疗4576人次,各类手术4517人次。

2006年4月25日，那是一个令吴静炯终身难忘的日子。当天,正在摩洛哥访问的胡锦涛同志，在卡萨布兰卡喜来登宾馆接见中国援摩医疗队代表。吴静炯和总队长高宏声以及其他11名队长一起作为代表参加接见。

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厅与援摩医疗队代表一握手,逐个询问在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胡锦涛同志语重心长地叮嘱吴静炯，一定要向队员们问好,你们辛苦了,你们要注意身体健康。简短话语,令吴静炯倍感亲切和温暖，在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拍下了那美好的瞬间。当天,新华社记者撰写的特写《你们辛苦了!》——记胡锦涛主席会见中国援摩医疗队》配发了胡锦涛同志与吴静炯亲切握手的照片。

如今,吴静炯收藏了那张珍贵的照片,在他的相册里、文集里,更在他的心底,长存着那份属于他拥有的“荣耀”。

其实,援摩期间,吴静炯还是承受着不小压力和挑战的。在一个原先完全陌生的国度里，面对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民众,作为12个人的“一家之长”,要带领“代表中国形象”的医疗队员履行“白衣天使”、“民间大使”的职责谈何容易。但是,吴静炯终于不辱使命,以身作则,以全心付出赢得了当地各方的一致好评。就在即将回国之际,当地医院的院长还不止一次地挽留他继续在当地工作,并许下了可公、私医院“兼顾”的承诺,以保证他的高收入。

面对如此盛情,吴静炯断然谢绝,并表示自己代表祖国而来，也一定会听从祖国的召唤，按时回国继续从事自己的医疗事业。

吴静炯强调，虽然摩洛哥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不如国内,但只有到了那里，才更能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更能体会到当地人民对中国的热爱。据他介绍,摩洛哥民众对医生比较尊重，与国内相对紧张的医患关系相比较，在那里当医生其实蛮有事业成就感，他笑言:“在摩洛哥当医生感觉真好啊!”



2007年,援外医疗队队长途跋涉步入撒哈拉大沙漠并与当地群众结下友谊。

张康乐：

男人更要担负起国家重任

金山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6.10—2008.10

2006年2月，金山医院按市、区卫生局要求组建支援摩洛哥拉西迪亚医疗队。有丰富临床经验和和管理经验的金山医院门诊主任、骨科主任医师张康乐任医疗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除了技术过硬、经验丰富,领导更为看重的是他为人处事的“厚道”。

此时，张康乐不仅已年满55周岁,家中还有两对八、九十岁老人,他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面对这种难以抉择的境况，张康乐说:“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对我来说压力也很大。但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国家需要我,组织信任我,我觉得家庭的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因为我是男人,男人不但要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更要担负起国家的重任。”

拉西迪亚省为摩洛哥的贫困省，医疗队所在的穆莱.阿里.谢里夫医院是拉西迪亚省唯一的一所省公立医院,拥有床位196张,虽说有着35年历史，却连一个简单的肝肾功能化验也做不全。

刚来拉西迪亚时，张康乐经常在门诊发现过去的一些患者，不仅骨折经久不愈合，而且有很多出现了严重畸形,患者痛苦不堪,对患者家庭、社会当地政府也产生很大的压力。究其原因，往往很大一部分患者是无力购买内固定材料。为此,张康乐特地把国内集装箱运抵和回国探亲时带来的内固定材料无偿并及时地应用到这些

骨折病人身上，不仅解除了患者因伤残带来的长久痛苦，而且使他们肢体的功能也恢复得很好，得到摩方的一致好评。

张康乐还开动脑筋,因地制宜,动手改制内固定材料。他将枯燥的业余时间变成了兴趣手工时间，拿手术的手也能灵活应用钢锯、锉子和老虎钳等工具,从设计、塑型到制作,俨然成了当地医院技工间的常客。中国医生的精巧技艺，让摩方同伴由衷地钦佩，这也造福了很多因缺少特定钢板固定不能痊愈的骨折病人。

张康乐说:“援摩这段时间苦中有乐,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灿烂时光,尽管困难重重,但我认为很值。”

鞠建平：

传播中医针灸的神奇疗效

浦东医院援外医疗队

摩洛哥,2003.3—2005.5

鞠建平作为中医针灸推拿医生，援摩期间在沙温省穆罕默德五世医院工作。鞠建平在医院工作期间,一名骨科护士患了坐骨神经病,服药无效,慕名来到针灸科。鞠建平凭借娴熟的技术,让该护士在接受3次治疗后就痊愈了。从此以后,该护士成了中医针灸神奇疗法的“义务宣传员”。

针灸是中医的一个分支，摩洛哥医务人员向来接受法国的医学教育，在他们的眼里，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针灸,充满了好奇。当地医院针灸科的医生只有中方医生，无摩洛哥方面的医生。针灸在摩洛哥很受欢迎,摩洛哥人觉得接受针灸治疗就像是做了一个

梦一样,梦醒来,病也痊愈了。而在鞠建平心中，他就是一位传播中国梦的使者,他在摩洛哥的工作,就是让传统中医特别是中医针灸融入当地的医疗诊治中。

有一次,外省一名膝关节肿胀、行走不便数月的病人，在当地医院几乎被判了“死刑”,医生们告诉他,已经延误治疗时机无法治愈了。该病人辗转来到穆罕默德五世医院,找到鞠建平。鞠建平为病人制定了温针疗法，一周3次针灸的治疗方案。果然,奇迹发生了,病人经治疗肿胀症状消失,并行走如常。

“上海来的神医”的美名也由此传开了。德图安市的前警察局局长,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当地医院治疗,打针对药不计其数却是不见好转。听说从上海来了位“针到病除”的神医,立即便来就诊,5次之后病人腰痛症状缓解。好客的病人邀请鞠建平去他家吃饭,鞠建平到市区观光,医患情谊甚是融洽。

回国将近十年，但在摩洛哥的一幕幕至今仍记忆犹新。鞠建平说,他赶上了发展的好时代,回到上海,正值医院积蓄力量，全力打造新的医疗卫生中心;合作共建,医院成为华山医院南汇分院，继而又成为复旦大学第11所附属医院(筹)。面对医院融入复旦“大家庭”的发展机遇,有着一身中医看家本领的鞠建平开始翻阅中医以外的外文书籍,做科研,学人文。

鞠建平表示，他不仅要为摩洛哥人民带去中医文化的精妙，也要把摩洛哥那种和谐共处的医患关系带到国内,更从我做起,为浦东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2008年,摩方卫生官员向完成任务即将回国的医疗队队长赠送纪念品。



1992年,在我驻外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医疗队员与中外来宾亲切交流。



2005年,医疗队员及摩洛哥医务人员与治疗痊愈的当地患儿合影。

本期4-5、6-7专版15位援外医疗队员的报道文字,分别节选自仇烨韦华、胡灵雨、崔梦玲、丁唯涵、王银香、周玉桥、王雅、严晓慧、宋远航、盛科美、黄文发对上述医疗队员的访谈稿，标题系编者所加。

照片由各附属医院相关部门提供。

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以及货币联盟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Robert Mundell

2001 年，我在上海 APEC 论坛上所作的主题演讲中就提到过货币联盟。我认为，如果能有更灵活的汇率、更多的货币合作，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世界经济能够更上一层楼。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过去两百多年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反思现状、展望未来。最初，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本位，同时英镑、美元等货币也积极寻求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一战期间，英镑的不可兑现性日益增强，而美元崛起，特别是二战后美元实力上升，于是美元和黄金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起来。20 世纪 40 年代，美元不断升值，相对黄金升值了 20%。1934—1971 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在 1944 年制定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进行兑换。随着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美国的黄金储备大幅下降。1971 年之后，美元逐渐与黄金脱钩，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实行灵活的汇率机制，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管理国际汇率协调。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系列危机，包括石油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所有这些危机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存在关联。

不同货币的地位与其国家实力相关，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也会影响货币的地位。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实力最强，美国已经开始发展，此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黄金时代，所有货币都以黄金作为基本价值进行兑换。在

国际货币体系的金本位时代，中国被排除在国际货币体系之外，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以白银为主导的计价方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力上升，国际货币格局发生改变，英镑与美元此消彼长，黄金在国际国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随之改变，很多货币都可以和美元自由兑换。1944 年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同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后，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日益严重，灵活性的浮动汇率重新回到国际货币体系中，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依然起主导作用。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同发展，各国货币对美元的依赖性也有所降低。欧元建立后，打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日益引人注目。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体量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如果继续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传统方法，难以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规模的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我们确实需要做一些思考。在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重要经验的同时，从国际层面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何去何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欧元与美元是关键币种，两者之间的汇率波动比较大，实现两者汇率的相对稳定非常必要。为此，需要在政府层面更好地协调金融政策。就中国而言，应考虑人民币与美元、与欧元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进一步把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此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替代性措施。

中美应寻求双赢局面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 Robert Zoellick

世界银行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定期研究，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作全球性研究。到 2008 年，只有 30 个国家能真正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来进行发展。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经济转型，扩大对外贸易、拉动内需、引进外资、鼓励创新都很重要。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开放的金融系统、更强劲的财政政策，要更高效地利用资源，还必须进行一系列大规模改革，包括土地、劳动力、教育、服务、消费等，关键是必须意识到有需要去做变革。近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打造多边合作机制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通过对话，中美双方应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共同探索双赢。在过去的发展中，中美两国在原

材料、农业、供应链、服务业、投资业、基础设施等领域都有着共同利益，开展了良好合作。同时，两国也应考虑其他合作方法与可能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性和全球性发展。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彼此间存在诸多差异。如果双方出现一些争议，一定要借助双边或多边关系，保持良好沟通，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从战略、技术的角度，从国家利益、双边利益的角度讨论协商，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中美之间具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对于威胁到共同利益的潜在威胁因素应有充分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随着中美经济彼此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如何以全球化合作来降低区域摩擦冲突值得探讨。双方应在联合国的大框架之下，加强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实现区域合作与更高层次的安全。网络安全是一种与传统形态不同的新型安全威胁，虚拟空间中发生的冲突、破坏乃至战争，也会造成巨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建立一个包括基础原则和规则在内的体系，更好地推动整合。

在新形势下探讨新的大国关系交互，其中的挑战不言而喻。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正在寻求转型和变革。目前这两个国家都是非常成功的经济体，与他们各自所在区域的其他国家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中美关系对全球态势影响巨大。希望今天在上海论坛上讨论的这些话题，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5 月 25-27 日，主题为“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的“上海论坛 2013”隆重举行。世界银行前总裁罗伯特·佐利克等五位嘉宾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现将部分演讲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方星海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放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

中国正处于一个对外开放非常有利的位置。这种有利地位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到中国的市场来，随之而来的是新技术、新研发力量。尤其是金融、教育、医疗卫生、通讯等服务业行业，目前在中国有非常好的市场机遇，能够吸引国外最好的服务业企业。

海外收购兼并与合作方面，中国的企业有很多新优势，主要体现在：一，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实力雄厚；三，中国的企业开发出了一些适合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使用的技术。

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可以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过程。人民币是潜在的国际货币，通过着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重要的贸易货币、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

拉动内需方面，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潜力。第一，中国的中央政府有能力发行相当多数量的长期债券，短期内能够迅速促进国内需求上升，对于完善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减少金融风险也非常有帮助。第二，中国人家庭观念强，重视教育投入，如果今后出生率能进一步提升，将带来大量内需。第三，中国有大量民间资金乐于进入金融、教育、卫生、信息服务等目前尚未开放的行业进行投资。第四，中国的城市化如能更快、更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推进，将对内需产生巨大推动。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本质上最强大有力的竞争点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有 13 亿非常勤劳的人民，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竞争优势，使中国的出口在全球非常有竞争力。其二，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专注于经济发展，非常愿意帮助企业发展。

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风险，主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需要加强管理，最关键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处理危机。此外，中国有大量国有资产，在处理危机时可用作缓冲。

总之，中国的发展问题存在，机会更多。只要把风险想透，把处理风险的措施想清楚、安排好，就可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处理风险，中国经济就会上一个新台阶。

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樊勇明

衡量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能否成为一支战略性力量，要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内部稳定性；第二，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与现有国际体系以及传统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第三，它能否对所在地区形成有效制衡。

从内部稳定性来看，金砖国家体现出四个共同特征：国家内部都要求转型发展，对国际社会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发出了共同的声音，采取了共同的行动。从内部看，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以及相互间的务实合作不断发展。从外部看，金砖国家已和现有国际体系以及传统大国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对话机制。

合作机制方面，金砖国家已出现政府和民间双轮驱动的发展态势。政府主导方面，已形成每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以及各界部长级会议、财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级会议，下设负责落实的具体工作小组，已有近十年的有效运作。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两个民间组织，一个是由民间智库组成的智库联盟，另一个是工商理事会。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是金砖国家生命力与合作机制化的共同特征。

在许多国际场合，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发出共同声音，采取共同立场。

同时，金砖国家也建立了联合外汇储备库，不仅有助于减少金砖国家受到的国际金融风险冲击，也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金砖国家正在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此举对金砖国家深化合作意义深远。

金砖国家已形成参与全球治理的清晰目标体系，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公平、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第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期、更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朝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第四，通过对话，以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方法积极解决气候、能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且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光靠现有国际机制来治理和解决全球问题远远不够。没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参与，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同时，每一个金砖国家都和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外交合作。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多种协商机制与合作机制。不能把金砖国家的合作与发展看成是一个国际体系对另外一个国际体系的取代，而是不同利益、不同机制相互并存，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

金砖国家内部也存在许多矛盾，包括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文化的差异，甚至于领土纠纷。但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共同需要和长远利益约束，要求金砖国家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这些长期因素决定了金砖国家合作与发展的有效性。

金砖国家合作的生命力如何体现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我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地区治理”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国或一个大国集团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创造或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繁荣、安全、稳定。金砖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个别国家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每一个金砖国家都代表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典型或领头羊。

在亚洲多元发展方面，金砖国家有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第一，从全球看，金砖国家所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合作共赢理念与亚洲多元发展、亚洲经济一体化是一致的；第二，从区域看，RCEP、APEC 等都是亚洲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第三，从次区域看，东北亚合作、亚洲经济走廊等也体现着金砖国家在亚洲多元合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舞台上,他们涂满油彩、光彩闪耀;舞台下,他们只是一群热爱舞蹈、热爱生活的普通年轻人。在复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凭借较深的专业素养和对舞蹈深沉的热爱,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创造着美好;有这样一个团体,它带着复旦人对美和高雅艺术的追求,步步向前。这就是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

十年: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舞

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成立十周年侧记

从四月中旬起,复旦校园里出现一种风格独特的海报,画面上舞者们一个个一半涂满油彩,一半素面朝。半面妆的独特造型吸引了师生们驻足观看。幅度大、效力强的宣传和魅力值爆表、养眼又亮眼的横幅海报,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

花开癸未,十年一剑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以下简称“舞蹈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即便是大一新生的,也早在新生之星的决赛上,见证过舞蹈团的实力——新生之星冠军作品《复旦猫进行曲》的缔造者刘显莹和她的搭档陈逸然便是舞蹈团2012年新晋的成员。

其实,从2008年起,连续四年,新生之星的冠军和部分亚军、季军、单项奖都出自舞蹈团,甚至出现了“舞蹈团出手必夺冠”的说法。

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成立于2003年,隶属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是一支极富复旦文化特色和青春活力的学生艺术团体。成员由复旦大学各院系中具有舞蹈才能的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目前共计团员30余人。2003年,舞蹈团不仅是学校为了参加一场舞蹈比赛而召集起来的临时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舞蹈团逐渐成长壮大,成为一支由舞蹈特长生和舞蹈爱好者组成的专业性舞蹈团队,并且在校内、校外甚至是海内外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十年来,在“形体美、人格美、校园美、艺术美”宗旨的指引下,舞蹈团不仅在校内外的舞台上展示了自身的艺术素养,也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和社会事务,为营造高雅艺术氛围、丰富校园文化、推广舞蹈艺术做出很大贡献。

十年后的现在,舞蹈团已经成长为学校的一支骨干艺术团,拥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完整而规范的训练制度和一整套推广体系的团队。

2006年,现在的指导老师张鹿加入了舞蹈团的大家庭。七年来,在张鹿老师的带领下,舞蹈团及其成员在校内,打造舞蹈品牌,参加十大歌手、新生之星、模特大赛等校园活动,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在校外,舞蹈团

更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江西、安徽等省,在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家,把复旦之于上海、上海之于中国的美好形象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此外,舞蹈团在校内外获得多个奖项,曾远渡重洋,赴悉尼歌剧院表演,并荣获“悉尼国际音乐节艺术贡献奖”。

在专注舞蹈事业的同时,舞蹈团还热心参与社会事务。通过义务教学、慰问演出等形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时妆静洗,血汗金莲绣

成就一个专业性的团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力。

舞蹈团为每一位成员提供了完善的培养和训练机制。除常规训练外,每年暑假舞蹈团也会安排团员进行集中强化训练。

每年夏天,舞蹈团的成员们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下,在北校区体育馆三楼舞蹈房开展暑假集训。而到了冬天,天气阴寒刺骨,舞蹈团的孩子们又会裹着大衣出现在排练厅。夏天炎热,为了保护关节不被空调伤害,舞蹈房里不能开空调,汗水滴在发丝、衣角,甚至会在旋转时飞出来;排练厅不允许吃东西,下午加排午饭就要在门外吃,冬天更是穿堂风过,水泥地冰凉。

艰苦的条件并不能影响舞蹈团成员们对舞蹈的热爱,他们对自己严格要求,认真排练。就拿最常见的基本功来说,普通观众会为现在网上也在热捧的“一字开”动作掌声雷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对于舞蹈团的成员来说,一字开不过是舞蹈中的基础性训练,是最为基础的基本功之一。他们在热身练软开度时候,还会在一条腿下垫高,使腿不仅达到“一字”,更达到200多度的“八字”。没有人天生便灵动异常,用现任团长张帅的话说:“两人对踩压胯时,舞蹈房里常是‘杀猪阵’。”

至于一些专项舞蹈的训练,更是辛苦异常。学过芭蕾的人都知道,缎面足尖鞋里的脚趾多是红肿残破的;有的时候跳着练着,脚趾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心里就暗自知道,指甲盖又翻掉了,即便是指甲翻掉,也不过是卸上创可贴继续练,因为“一天不练自

己知羞,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而训练剧目时,不仅要承担基本功训练可能带来的身体上的压力,还要承受着集体的责任感和同伴带来的压力。有时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总达不到预期,好在舞蹈团是一个温暖如家的团体,在同伴的鼓励下,往往都能走出瓶颈,实现突破。

“你们看我们都很瘦,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跳舞、训练或者演出,只能匆忙吃几口饭便继续投入训练。”记者观察到,由于人数有限,很多时候都需要同学在同一场表演中参加不同的剧目,需要在谢幕后迅速的抢妆,由于出汗衣服难脱难换,张鹿老师提醒同学们随身带一条毛巾擦汗。舞者并不是随时随刻都是那么的潇洒自如。我们不是舞者,或许很难体会舞者的辛酸,也无法懂那种对舞蹈深沉的爱。

舞转红袖,换得满堂惊

5月21日,期待已久的“我们的舞”十周年专场演出终于在光华楼三楼多功能厅演出。

这次演出融合了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芭蕾舞等多个舞种,带领观众在不同的时空穿梭。同时,舞蹈专场又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大学生的时代风貌。比如《Just be myself》就体现了大学生对未来生活的迷惘和对寻找梦想路径的坚定,《复旦协奏曲》表现了复旦大学人猫和谐的氛围,《流沙坠简》在展现丰厚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展现出大学生对古典文化向往。美轮美奂的灯光和舞蹈,以及它其中蕴含的丰厚韵味,让观众大快朵颐,享受了一场视觉听觉与文化盛宴。

问及专场演出的准备,团长张帅表示:“没有何时开始准备之说,这些剧目都是一直在排。十年了,可以给给大家一个交代了。”专场演出中的很多剧目,都是过去十年间在各地巡演并获得奖项的,比如《流沙坠简》就是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一等奖和全国一等奖的剧目。

一位2012级技术科学实验班的女生说,“早在高中就听闻复旦舞蹈团的大名,终于能够亲眼看到舞蹈团的演出,觉得舞者大气、高贵、优

雅,舞台和服装流光溢彩非常漂亮”。舞者是高傲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身体和心理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时,依然可以波澜不惊、优雅高贵。演出曲目《相和歌》,是一支需要在鼓上起舞的舞蹈,要求音乐的鼓点和舞者的律动相契合。观众多是看到了舞者带领我们梦回大汉的盛景,看到裙摆如海螺般张开、旋转,却很少知道由于鼓质量很轻、鼓的体积大小而且鼓面不是完全平整,旋转其实是很容易掉下去的,跳鼓上舞时自始至终要提着一口气。

欲说还休,绵绵舞团情

加演尚未开始时,记者注意到坐在演出场第一排一个化着妆的女孩,她注视着台上还在紧张排练的队友。她说:“我的心情可能和她们不一样,我是今年毕业的研究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舞蹈团演出了。”这个女孩,就是舞蹈团的前团长,现在已经研究生三年级的“旗姐”,王旗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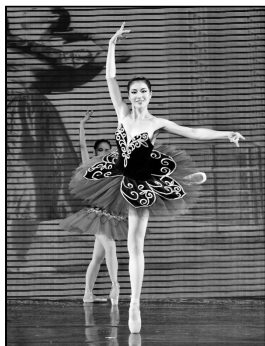
王旗从大一进入舞蹈团到研三。“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王旗说,自己从五岁起开始学舞蹈,对舞蹈有着深深的爱,舞蹈团这个平台带来了许多机会,更多的是与舞蹈团结下的难以割舍的情谊。“跳舞,不仅可以让人塑造形体美,收获良好的气质,也可以在精神上让人养成追求美的习惯。跳舞的人,往往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也许有点小强势。”

在舞蹈团中,大家都知道,“在群体舞中,一人不到,就会影响整体效果”。

对于新晋的成员来说,舞蹈团除了是家庭,也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份成长。从新生之星大赛上略胜维嫩《复旦猫进行曲》,到剧情离奇完整、人物结构更加复杂的《复旦协奏曲》,一次次的修改和完善对于两位新晋的成员不仅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逐梦的旅程。

舞蹈团十周年演出虽然早已落幕,但无论是舞蹈团的成员,还是观众,都没有停止对美的热爱和对梦的追求。正如12级舞蹈团新晋成员刘显莹所说:“人生本是生活的梦工厂,只要梦还在,演出就没有落幕……”

文/陶蕾 摄/刘畅



【学术】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概念中国逻辑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战略

■ 苏长和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八大报告关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巩固者、文化建设的生产者、核心价值体系的守护者,“三个自信”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要深入地理解其意义,首先需要理解一个国家特别是文明独立、制度自治的大国,为什么哲学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存在如此紧密的互补关系?

我们不妨从中国有没有“西学”这个问题说起。西方“中国学”的重要特点是用自己的价值和概念来研究中国,而中国关于西方的研究大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介绍层面;第四,我们在用别人提供的概念和框架研究西方,不自觉地成为了别人学问的分支;第三,我们经常不自觉地用别人提供的概念和价值来研究自己,很容易把自己肢解掉,而且很难讲通中国的道理。第四,鲜有用自己的价值和概念研究西方的,而唯此才能建构自己的“西学”。前三种学术生态客观上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之间出现张力,呈现打架甚至两张皮的状态。“三个自信”的提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核心之一是如何自觉地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提炼核心价值和概



苏长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主要论著有《走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主编)等。

念,研究自己甚至研究别人,最终形成中国理论体系。

这就回到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有其学术逻辑和规律,这个逻辑讲得是“多”,也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也有其政治逻辑,这个逻辑讲的是“一”,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学术研究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是很难的,对文明和制度自治的国家来说,成体系的逻辑自治的社会科学最终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巩固具有关键的意义,两者合,则国家价值体系巩固,两者分,则国家价值体系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要辩证地处理“一”、“多”和“统”的关系。学术的规律是“多”,政治的规律是“统”,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多不取代一,我们观察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学术和政治关系,大致如此。当我们完全用别人的概念和价值研究自己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自信往往会被逐步蚕食掉,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离。

这就需要我们在立足本土,同时也有世界眼光去确立形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理论体系框架,其核心是将自己的价值、道路、经验予以概念化和体系化。对当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自觉地逐步学会消解、消化西方概念,明白这些概念所附属的西方政治文化的背景,不可简单把这些概念套用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因为若这样,自己道路的理论解释权必将旁落他人,很难有自己的话语制高点。其次,要努力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寻找中国化的概念把自己的道路制度讲清楚,形成教材体系,以致可以去讲外人的故事。

其实,这些核心概念就在我们身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是否可以用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概念做基础,去取代西方政治经济哲学教科书支离破碎的“天下为私”逻辑。说“公”并不是说要灭“私”,公的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资源是相接的,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也是

谋合的,其实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趋势。利用这个概念,我们同样可以去研究美国、研究欧洲大陆,研究其他地区政治形态和制度安排。对于国际关系而言,这个概念可以产生分支的“公道”概念。在西方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讲“人道”多,重“公道”少,这是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的根源之一。对任何政治社会来说,没有“公道”,何来“人道”呢?设想一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齐心协力,逐步挖掘和确立自己的“元概念”,进而发展“分支概念”,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才可能在“西学”中真正独立出来,而且这种创新一定是迸发状态的。假以时日,它们以研究成果和教材体系形式,借助国际交流和教育过程,自然会在国际上传播。当更多的外人用这些中国化概念研究社会问题时,国家的话语权自然会迈上一个大台阶。这个时候,真正的国际知识格局才会完成转移。当然,这个过程不会很短的,但必须要有耐心和恒心,而且需要战略性地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做。

回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我们讲“多元”,但是世界上几乎任何大国,“多元”都是在“一”的前提下的多元,离开了“一”讲“多”,社会必定涣散。当然,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有自信包容“多”,而不是无底线地纵容“多”。我们观察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看到的更多是其“多”,但忽视了其“一分为多”、背后隐藏的“一”的实质。所以,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核心是“一”和“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阶段高度重视“一”和“统”,比如反复强调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统”,继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以及借鉴了世界其他优秀文化的“统”。在汲取人类先进文明上,中国其实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文选,会发现他们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将人类先进合理的文明学到了,中国就是一个大国。这种学习精神不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你将别人优秀且对自己合理的东西学到了,文明的“统”就会向自己一边汇合。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个伟大的进程是有世界史意义的,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机遇。当然,这对学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抽象自己实践的概念过程中,就需要努力做到立足本土实践基础上,熟知官方的、外国的、传统的和民间的四套话语体系,并学会进行转换与升华。世界政治总归会回到一个“多”的时代,物质力量格局已经出现深刻的变化,物质格局变化一定也会带来知识格局的变化,“多”的时代意味着西方自诩为普世的社会科学知识会自然降级为地方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过程对新兴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建设是极大的机遇。概而言之,对中国学者而言,如何在知识生产上摆脱长期的受动,在“三个自信”中转变为能动,为人类文明贡献新知,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挑战 and 机遇,也关乎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问题。

【观点·SBRC专栏】

【来论·我的中国梦】

把握战略机遇期 谋求“改革开放”新局

新闻学院教授 张涛甫

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持续冲击与中国“深水区”改革带来的挑战叠加影响,致使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空前复杂,大大加大了决策的难度和行动的不可确定性。这就要求中国善于驾驭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把握机遇,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获得主动权,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

从国内形势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充分凸显出来,各种矛盾空前聚集,社会承受度逼近极限,中国社会对改革的预期也达致新的历史高位。改革新共识渐渐浮出地表,新一届中央的改革决心已定,新一轮的改革箭在弦上。但是,如何改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情势,不改革无路可走,但若改革,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改革决策需要谨慎为之。目前,既是一个难推的艰难时刻,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期。在这个极限时刻,正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改革、主流价值观重塑以及国际政治战略等宏观战略做一次系统设计。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的困扰。特别是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往往是双重的。美国国际战略重心转至亚太,空前考验中国的大国智慧,韬光养晦的应对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崛起中国面对新世界格局的要求。中国需要善于利用国际游戏规则,充分利用目前国际关系格局变易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谋求发展的空间,为中国在国际空间中谋求有利的位置,掌握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国际因素越来越成为今天中国改革绝不容忽视的一面。就像3月23日《环球时报》社评所说的:“中国改革现在进入了深水区。其实在国际上,中国崛起也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两个深水区必须受到兼顾,它们都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未来。”去年11月,该报曾发表过一篇充满忧患的社评,说:“未来10年至15年,是中国大历史盛衰的关键期。平安走过去,中华民族的前途豁然开朗。走不过去,中国有可能大倒退,甚至被肢解。”……

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战略机遇期具有不可复得性,稍纵即逝。这就要求中国在洞悉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重新绘制“改革”和“开放”路线图,在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做正确的事情,抓住机遇,科学决策,精准行动。由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已经交互影响,国内的复杂性与国际的复杂性叠

加影响,造成决策的巨大难度。而且,在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内与国际信息的互动传播变得更为频繁,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把国内与国际割裂开来对待已经不可能了,治国理政要从国际视野观察国内问题。

当前,把握战略机遇期,要从两个方面着力:

国内方面,以“改革红利”为突破点,抓紧研究今后十年改革的突破点,寻找改革的空间,把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准确研判的基础上,迅速找到改革杠杆的支点,撬动新一轮改革。此次改革从民生突破,以社会建设为重点,以宏观制度改革为保障,以稳定发展为前提。

国际方面,以“开放红利”为突破点,抓紧利用世界秩序变革的契机,抢占国际政治空间,争取国际表达话语权,要改变中国“软实力”短腿的不利局面。此前,中国做得多,说得少;即便说了,也说得不够好,至少别人不认为我们说得对。“开放红利”需要中国利用国际话语空间,用有效的话语表达获得国际理解和认同。此后,中国要想创造更多的“开放红利”,必须“软”、“硬”兼施,即“硬实力”和“软实力”齐头并进,改变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被动局面。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进行他的连任胜选演讲,演讲中提到“让一个水管工的儿子也有成为一名医生,一名律师,甚至美国总统的可能。”这和美国人平时讲到的“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吃得起饭”一样,是“美国梦”最简单最直白的解释。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梦是一种更注重个人感受的理想综合体。在直接层面上,它是一种对个人主义、个人精神的鼓励;在间接层面上,是对政府执政行为的督促——必须要有政府对客观环境的监控和作为,才能有个人主义大张拳脚的现实。

反观我们现在提倡的“中国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定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据党内著名理论家李君如先生的看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这也是实现21世纪头50年“中国梦”和后百年“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从这些定义中,我们看到个人主义的色彩明显没有“美国梦”来得浓烈。将所有中国人笼统地放在一个“中华民族”的集合中,想上至庙堂鸿儒,下至江湖白丁,都为其感受到振奋和希冀,显然是不够现实的。

环球时报主编辑锡进在2013年5月26日的微博中提到:“中国在进入个人主义活跃的时代。根本原因是社会逐步繁荣,法律开始发挥作用,社会成员有了更多独立存在并追求个人幸福的基础。让个人主义冲击一下中国,应该是补课。但万事须有度。集体主义仍是这个人口大国的现实需求。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和资源条件,永远难成欧洲那样由个人主义加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这段话恰恰地解读了“中国梦”中隐藏的“个人主义不存在感”。身为国家的公民中的一员,“中国梦”却貌似和自己关系隔了几层,真有种啼嘘不已的感慨。但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能把集体主义搞定已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这好像计划生育政策让众多多胎儿不具备成长为“人”的资格,但也能缓解了众多资源环境压力。让存在的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得更好,这也许就是集体主义所能做到的事情。

胡锡进先生说“中国永远难成欧洲那样由个人主义加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这样的话恐怕有失偏颇。在笔者看来,现阶段“中国梦”恐怕是要为下一阶段的“中国梦”所努力的。当我们可以听到新闻联播里说“让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有房子住,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有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现阶段集体主义教育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一天。

『中国梦』中的集体主义

文/胡灵雨



复旦人物

内敛不张扬 扎实不浮夸

——访徐州市市长朱民校友

复旦打下的扎实学术根基

“您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听到记者的这个问题，从走进逸夫科技楼到在接待室中坐定，神色一直沉稳庄重的朱民，眼角也泛起了层层的笑意，似乎是被牵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昨晚我还一个人校园里走了走，看到学生宿舍前的排球场还在，想起了我学生时代爱打排球。那时除了图书馆，排球场就是我最爱去的一个地方了。”谈起学生时代，朱民动情地说。

1980年9月，朱民考入了我校经济系。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朱民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复旦的三段求学经历。从1980年到1984年，他作为本科生就读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8年到1989年，他回到母校在西方经济助教进修班学习，此后的三年中，他又在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完成了研究生学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是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与经济学专业有关的研究和教育也应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朱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复旦为他的求学生涯打造的优异平台，作为第一步，这为他之后的人生之路和从政生涯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什么同样是读上几年书，我们在复旦能比在其他学校有更大的收获？”回想起当年在复旦求学时异常优质的学术和教育资源，朱民感慨万千。他清楚地记得，为本科生上课的都是名教授。由于传统的教材已经不再适用，本科生所使用的几乎所有教材都由各科老师亲自编写。从每一次的教学互动当中，学生都能大获裨益。

“在经济系时，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和我们探讨，我们的教材编写到这一阶段时，学术界有哪



几种观点，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观点。对当年这种探讨互动的教学模式，朱民记忆犹新。他坚信，这大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因为学生接触到的不仅仅是课程本身，更是所有与课程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教材编写的过程对于老师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会直接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朱民说。

解读复旦精神

“对复旦精神有很多解读，有的人解读校训，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但我的理解其实很简单。”说到这里，朱民的语速微微放缓，但每一个字都更加清晰有力。“那就是，内敛，不张扬；扎实，不浮夸。”

每一个字都沉淀着朱民在复旦学习和生活的思考。“复旦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他感慨颇深地说，复旦的教风和学风都十分严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教学和生活当中，为人都比较真诚，没有权利、利益的争夺。

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定为最明确的目标，似乎是个美好的80年代所独有的纯真和热血，在那一代年轻人心中蓬勃成长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如今依然能在朱民的眼睛里看到昔日闪闪发光的痕迹。“当初毕业留校时，一位师兄的话非常

朱民：

汉族，1963年9月出生，江苏昆山人。分别于1984年、1992年毕业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共江苏省徐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打动我：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我认为能做到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毛主席曾经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如果我们做事都能认真，就没有什么会做不好。”朱民坦言，复旦精神伴随着他走上工作岗位，包括在后来长达十多年的从政生涯里，影响着他对大小事每一件事的态度。

“我也许很难具体讲复旦精神是如何影响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我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诚恳地说，受良好的教育，受高尚的人格魅力的影响，这种学生时代潜移默化的濡染和习得，对于学生的成长乃至一生的经历，都是益处良多的。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会随着日后工作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更新。但是正确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是扎根在心里的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增长，会生长发芽。”

母校的礼物

“这次重返母校，朱之文书记送了我一件礼物。”朱民微笑着说，“他把我大学时期的成绩记录送给了我。如果我在大学时期偷懒，没有好好念书，那么我现在拿到这份成绩一定会脸红。”说完，他又笑着补充道：“好在我当初没有偷懒。”

“生活在当下，你的所作所为都会被记载到历史中，所以我们要奉行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谈到践行复旦精神，他认

为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平常心，无论是在最基层的岗位还是领导岗位上，我们都应该明白岗位是工作需要，不会伴随人的一生。

“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实施计划分配了，你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应该扎扎实实做事。”朱民认为，重要的不是别人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要有责任心，是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认真走下去。“从职业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对社会而言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在朱民看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也是回报母校最重要的方式。他在离开母校之后，辗转多个工作岗位，在企业、高校、市县、省级机关都曾任职。在1984年到1992年间，他曾任苏州丝绸工学院教师、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但是在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发现“学经济不仅要研究理论，更要付诸实践”，于是他辞去了企业部门。“90年代流行‘下海’，但我没想到后来我又被‘捞上了岸’。这中间的选择有主动也有被动，但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要踏踏实实做事。”他认为，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也就是对母校最好的回报。

“能够进复旦学习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在学期间一定要多学，多问，不要浪费时间；今后走上社会，还是要扎实工作。”朱民复旦学子提出了殷殷期望。他说，尽管这一代年轻人走上社会的起点不一致，“拼爹”、“拜金”等社会风气可能会大行其道，但路最终都是自己走的，即便是父母也不可能陪伴一生。

“复旦的学生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我能够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要实现社会价值。”朱民说。文/邵安琪

鹿鸣书榜

《佛教神话研究》

王邦维 陈金华
中西书局

本书主要包括：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造像功德经》所体现的佛教神话模式；佛教文学和艺术中的九色鹿传说等。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全二册)
(法)布罗代尔

商务印书馆

本书从总体历史的思想出发，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以考察，立体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及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

《虎头金粟影：维摩诘变相研究》
邹清泉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在中古时代的宏大历史视野中，以维摩诘变相为研究个案，通过维摩诘经遗存，实现基于“历史性”层面的中古维摩诘变相的阐释。

《殷代商王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韦心澄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该书从政治地理结构层面来分析商后期王国领土范围，探讨领土内的政治结构，即政治地理区域之分类与各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方式以及地方对中央担负的功能；研究商王国与周边邻近方国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

《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
刘经富 中华书局《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杜维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土文献·第三辑》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编 中西书局《秦汉简牍研究存稿》
杨剑虹 厦门大学《近代学术导论》
朱维铮 中西书局《汉魏晋南北朝佛经辑考》
封野 凤凰出版社
根据鹿鸣书店双周排行榜
文/干悦

中国能源安全及国际能源战略的思考



《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
作者：潜旭明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随着人类步入工业化阶段，能源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要战略物资。美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安全是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变化对于国际能源体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书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入手，归纳和分析了一百多年来的能源战略，从过程和结构两个维度分析美国的能源战略。提出了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变量及其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变量有三个：权力、国际能源战略和国际能源体系，其中权力为自变量，国际能源战略为中介变量，国际能源体系为因变量，并运用

这一分析框架分析了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缘起、形成、危机、重构、发展和强化及其对国际石油体系的影响。

书中提出了关于中国能源安全及国际能源战略的几点思考：牢牢把握21世纪的头20年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之所在。

制定国际能源战略，加强对国际能源体系的影响。在能源供应板块方面积极推进能源外交；

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多元化参与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在能源需求管理方面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积极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在能源通道安全方面加强海军建设，发展与中国力量相称的海上力量。在增强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方面构建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提升国际原油价格话语权；建立完备的石油储备制度；在国际能源机制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机制，与现有的能源国际组织，特别是中国作为重要成员的国际组织中推动创建国际能源合作的政治框架。

文字辑录/何成

往事如烟

追忆金重远老师

1988年,我刚入复旦历史系读本科时,指导员李立刚老师曾询问我的学术兴趣重点在哪里?我答是世界史,尤其对苏联东欧问题感兴趣。他说可以给我介绍系里一位金重远老师,让我有问题可以向金老师请教。某天下午,我按季老师为我联系的时间,来到了文科大楼9楼,在某教室内拜会了金老师。金老师身材不高,待人很客气,他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说自己每星期二下午要来系里上班,以后若有什么事可以在这段时间来找他。

回去以后,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了金老师的背景情况。原来这是一位上世纪50年代初曾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知名教授,精通俄、法、英等多种外语。我着实吃了一惊,我这个不满20岁的毛头小子,居然与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辈学者打了个照面。由于兴趣使然,此后我便多次前往该教研室聆听金老师的指教,有时候顾云深老师和王海良老师(后调往上海社会科学院,与我成为同事)也在场。

大概在二、三年级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和德国军事学说的长文,请金老师指教。由于初次写学术文章,其中漏洞颇多。金老师并不因我稚嫩而慢待,仔细阅读以后,他指着稿子,点出了不少思路、布局、用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今天我仍记得他当时的话:“你的这个题目,以前有很多人做过研究,所以以后选题还是要注意新意”,“你里面写‘希特勒的德国’,又写‘贝当的法国’,前一个用词是可以的,后一个却不可以,因为前者是独裁者,后者并不是,贝当对法国并没有希特勒对德国那样的控制力”,“以后要多看点书,特别是要把外语学好”……此后,我仍然经常请金老师指教拙文,有些文章不在金老师的专业范围之内,他就转请其他老师指导我,我记得其中有林太老师。

金老师似乎是比较喜欢体育锻炼的。有一年暑假,我在学校的游泳池游泳,忽听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金老师。他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挥动臂膀游动起来却不输年

轻人。我猜想,这可能是他当年留学苏联时养成的习惯。

到四年级的时候,金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次世界史的选修课,我当然要前往听讲。他上课时不用讲稿,却能侃侃而谈,讲到有趣处常常自己先笑起来。课间,我还曾看到他在走廊里和黑人留学生用法语交谈。

1992年,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此后还与金老师接触过几次。1993年夏,我拟撰写一篇有关二战时期德国仆从国军队的论文,有些问题搞不明白,遂登门向金老师请教。金寓在凉城新村,金老师当时午睡刚起。他并不因我的唐突来访有所不悦,相反,很快就开始了我“讲课”。他说他负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即将出版,有些资料可以从里面查。他还跟我谈了俄奸弗拉索夫“俄罗斯解放军”的情况……金老师所著的《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我读了两遍,从中获益匪浅。

2000至2004年,我回复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职),

此时我的学术兴趣已完全转向中国近现代史,所以没有再和金老师有过深入的交谈,只是见面时打个招呼而已。金老师知道我在历史所的《史林》杂志担任编辑,曾通过我两次向《史林》投稿,一篇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1948年苏南冲突的再审视》,另一篇是《独立战争:西班牙19世纪的第一次革命》。两文后来均被刊用,而且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所以这两篇论文我都仔细阅读过。

后来,当我负责《史林》的口述史增刊时,曾问同学赵庆寺(金老师的博士生),是否可以给金老师做个口述采访,请他谈谈自己的学术和生活经历。但此事因故拖延下来,至今令人遗憾。

去年6月7日,金重远老师在家中去世……

在我学术初萌的年代里,金老师给了我有益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平易近人印象至深。我要像他对我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文 / 马军

诗情画意

中国梦

人人有梦想,
个个怀理想,
五千文明史,
浦江源流长,
优良传统,
继承又弘扬。

全民同梦想,
共同树理想,
中华再复兴,
国家更富强,
人民多幸福,
和谐乐小康。

精神强国魂,
道路宽又广,
机会倍珍惜,
团结增力量,
艰苦奋斗,
实干兴万邦。

梦想情满怀,
理想插翅膀,
举国努力干,
实现有保障,
盛世谱华章,
前程美无疆。

作 / 周永忠

健康提示

居家防治白蚁

每年4-6月是白蚁分群繁殖高发期。室内如发现白蚁,不必惊慌,也不要使用家庭常用杀虫手段灭蚁。因为这些手段通常只能杀灭少数飞出的白蚁,并不能彻底消灭白蚁,反而会惊扰白蚁飞到其它区域,应及时向专业防治机构求助。

家庭防治白蚁以预防为主:房前屋后不要堆积木材制品,如废弃家具、干柴等,以免招来白蚁;屋内要保持通风干燥;时常检查衣柜、桌子等,看是否有虫蛀现象,早发现早解决;如发现有蚁洞存在,不要轻易破坏,以防蚁群扩散。

对于少量飞入室内的白蚁,可采取三种简易的灭蚁方法。

1、将新鲜松木、甘蔗、松树皮等装入30-40立方厘米大小的木箱,将用淘米水淋湿的麻袋覆盖在木箱上,木箱置于地上。每10-15天检查1次,发现大量白蚁被引诱聚积后烧掉木箱。

2、在日光灯下放一盆水,滴几滴煤油,光源距水盆不能太远,可诱杀有翅成虫。

3、将被蛀食的物品置于60℃的温度下,4小时后可有效杀灭其中的白蚁。

文 / 盛贤

行里且驻

一河、两溪、三桥

沙溪,古名沙头,又名印溪、团溪。唐代龙朔初(公元661年)形成村落,宋、元时形成集市,后渐起繁华,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如今的沙溪古镇位于太仓市中西部,离上海很近。

我和友人一同前往沙溪踏青。凡是没游历过的地方都是陌生的,到了沙溪也是如此,我们走着走着便找不到北了,不得不请教当地的“老土地”。听了介绍后,我们才得知沙溪的风土人情就在于古镇有一条河、两条街、三座桥,于是按图索骥。

一条河是指横贯全镇的威浦塘。威浦塘是条人工河,开掘于北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是条千古老河。河道水面

宽阔,微风一吹,清波涟涟。有趣的是河道中还有一座小岛,长满芦苇,小鸟在其中叽叽喳喳。小岛因形似橄榄,又称橄榄岛,实为古镇一大特色。河道两旁的屋宇挑梁出檐,承继宋代建筑风格,以斗拱支撑房檐与墙体,可谓巧夺天工。

威浦塘上横跨着三座古石拱桥,分别是庵桥、利济桥(新桥)和义兴桥(曾家桥),均为典型的清代桥梁风格。三桥如霓虹卧波,桥身桥影辉映成冰轮满月。古镇完整保存了旧时的城防体系,街有街门,巷有巷门,桥有桥门,呈现出先人们的生活风貌。由于当地政府改造古镇时修旧如旧,游人走在古镇里颇有穿越时空之感,仿佛走进了明清时代。

古镇的人文景观也不少,“隐逸生活”的乐荫园是元代隐士瞿孝悌的私家园林;“巧夺天工”的龚氏雕花厅是清乾隆年间富商龚氏的住宅;“一代舞魂”吴晓邦故居则是融合了欧式风格和江南韵味的小白楼。镇上还有一座舞蹈艺术馆,展现的是吴晓邦作为中国新舞蹈艺术开拓者的“舞之足迹”。

夜晚,华灯初上,古镇比白天更为宁静。三座古桥上却人头攒动,从城里来的摄影发烧友一拨又一拨,轻重武器、长枪短炮齐出动,古镇、古桥、古河、古树、古风貌,全部定格在镜头里。镜头里的沙溪,美不胜收。

文 / 陈志超

文化拾趣

诗中童趣

古诗词中的儿童并不鲜见,他们天真烂漫,憨态可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童真童趣。

风和日丽的天气最适合放风筝,高鼎有诗云:“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除了放风筝,扑蝶也是孩子们极为热衷的另一项游戏,杨万里有诗曰:“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此外,捕蝉也是不少儿童年的共同记忆。乡间的儿童大多是捕蝉高手,一首捕蝉曲成就了童年不可或缺的乐趣,“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泛舟与钓鱼同样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白居易在《池上》一诗中这样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类似的情景在辛弃疾笔下也出现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在另一首《观游鱼》中,白居易则这样描述儿童钓鱼的情景:“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

文 / 郭华悦